

李红军◎著

临翔南美拉祜族 反贫困问题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资助出版

临翔南美拉祜族

反贫困问题研究

李红军◎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翔南美拉祜族反贫困问题研究 / 李红军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467-9

I. ①临… II. ①李… III. ①扶贫—研究—临沧市
IV. ①F127.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5603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策划: 张丽华
责任编辑: 李红
装帧设计: 郑明娟

李红军
◎ 著

临翔南美拉祜族
反贫困问题研究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43千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467-9
定 价: 25.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概 述	(15)
第一节 南美拉祜族乡简介	(15)
第二节 南美拉祜族族源考辨	(19)
第三节 南美拉祜族族称	(26)
第四节 南美拉祜族迁徙史	(34)
第五节 南美拉祜族语言文字	(42)
第二章 南美拉祜族反贫困经历回溯及成效审视	(48)
第一节 南美拉祜族生活原态	(49)
第二节 政府推行反贫困之策	(58)
第三节 南美拉祜族社会生产方式变迁	(67)
第四节 南美拉祜族前期反贫困成效简评	(77)
第三章 南美拉祜族生存现态之文化再观	(84)
第一节 物质文化	(85)
第二节 制度文化	(98)
第三节 精神文化	(104)
第四章 南美拉祜族贫困的文化根源探寻	(113)
第一节 文化交流不足	(114)
第二节 惰性文化心理作祟	(119)
第三节 文化适应性低下	(125)

第四节	文化自觉缺失	(129)
第五章	南美拉祜族反贫困对策再思考	(133)
第一节	转变物质扶贫结构与方式	(135)
第二节	推行文化扶贫之策	(144)
结 语		(160)
参考文献		(164)
附 图		(168)
后 记		(169)

导 论

反贫困与现代化相连。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18 世纪以来,现代化成了世界的潮流,也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若将 18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开端,至今,世界现代化大致可以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涉及 18 世纪机械化、19 世纪电气化、20 世纪 50 年代的自动化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信息化四次浪潮。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典型特征的经典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型现代化。目前,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国家为 29 个,约占总人口的 18%。大约有 90 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之中,仍有 12 个国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21 世纪预计将有 100 多个国家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有 80 多个国家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达国家将完成第二次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复杂性和艰巨性超过了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其突出特点就是两次现代化并存和分布不平衡,少数地区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底线,多数地区却还处于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① 至今,我国现代化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演变,贫困状态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演变,反贫困的战略也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演变。改革开放前,我国贫困是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绝对贫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转变到

^①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0: 世界现代化概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以区域贫困为焦点贫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则转向了由社会阶层分化造成的相对贫困为核心。据此，国家的反贫困战略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在第一阶段，政府通过组织一个集体主义体制为人们提供福利保障。这一体制以工人阶级的领导为其政治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并认为集体主义是人们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相对贫困的现象并不普遍，而平均主义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绝对贫困现象。在第二阶段，传统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战略转变为以区域发展为导向的反贫困战略。政府通过反贫困计划，把对特殊贫困群体的救助与经济整体目标相协调。在第三阶段，面对市场的挑战，政府使用再分配手段来反贫困，从而导致了近年来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这一发展不仅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它也正在向乡村扩展。例如，近年来国家启动了城市低保后，开始对农村开展社会保障的试点，并进而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保障广大农民基本的福利需求。^①

虽然中国反贫困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而且出现了新的形势和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反贫困问题进行更持久、更深入、多角度的研讨。中国在 30 余年大规模扶贫开发实践中，让 6.6 亿人摆脱了贫困，以致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同时，截至 2013 年年底，按照国家扶贫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 8249 万。2014 年 4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 2 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场合首次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来

^① 林卡，范晓光．贫困和反贫困——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J]．社会科学战线，2006（1）．

说明中国的贫困问题。这表明中国虽然在 30 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仍是一个贫困问题客观存在且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得到大幅度提升，我国也需要以相应的国际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即人均日收入 2 美元应当成为重要的参照系，这是一个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中国反贫困政策涵盖的对象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扩展，这将是新时期反贫困政策的一个飞跃。李克强总理对此也有相应的表述。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范小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为扶贫开发创造了有利环境和条件。但他同时也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① 如今，我国社会各界着力解决的贫困问题更多意义上和社会阶层分化相关，是一种相对贫困。而谈到社会阶层分化，由此涉及的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梯度发展现代化战略。在梯度发展战略中，以不均衡为起点实现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西部地区，尤其是地处山区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这场经济超赶战争中无疑是最大的失利者。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主要面临的“四大挑战”中，特殊贫困矛盾突出便是其中之一。地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偏远山区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边缘性特征明显，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形态特殊，公共服务欠缺，地方病严重，这些地区人均产值、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为西部县平均水平的一半、

^① 王仁贵：中国减贫下一步 [N]．瞭望，2012-2-20。

43% 和 70% 左右,但贫困人口却覆盖了全国贫困人口的 70% 以上,扶贫工作的难度大、成本高。^① 因此,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了现阶段我国反贫困战略中的重点,而与第三阶段反贫困战略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相对应,贫困程度较深的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也成了我国政府现阶段反贫困问题的重点地区。因此,中国的反贫困工作远没有结束,今后需要向更深入、更彻底的目标迈进。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在如此广阔的区域中,城市面积极少,山区农村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些农村地区大多民族杂居,所处的地域系统各具特殊性,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还是民族文化上都存有极大差异,社会文化生态极其复杂。回顾“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期推行,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西部民族地区山区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但西南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自然、人文环境遭到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今天,部分地区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负面效应已经凸显。事实证明,西南民族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其反贫困问题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以效益和速度为唯一追求目标,要解决其贫困问题,唯有在基于实地调查所获数据材料之上,客观分析其贫困成因并探寻可行的反贫困之策方能取得成效,照搬他法的生硬反贫困途径是难以奏效的。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山区农村反贫困问题,需要正确解读其贫困内涵,探寻其贫困成因,并最终提出根源性的反贫困之策。

云南省反贫困工作依然艰难。2010 年至 2015 年,全省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83.18 亿元,让 44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但目前仍有 93 个尚未脱贫的片区及重点县,居全国第一位,农村贫困人口 574 万,居全国第二位。

对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国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不无启

^① 王仁贵. 中国减贫下一步 [N]. 瞭望, 2012-2-20.

示。早在 18 世纪,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世界现代化的帷幕,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典型特征的经典现代化便带来了工农差别、城乡问题。与此相关,贫困问题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反贫困问题研究也就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19 世纪后,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按研究方法、内容、结论存有的差异,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结构论或结构解释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策学派、冲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五个代表性学派。具体而言,其主要观点如下:①马克思主义。在所有的学派中,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关注贫困问题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制度造成了贫困。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力,这便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必然贫困化。而且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②政策学派。政策学派认为,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具体而言,制定政策本身(如英国“圈地运动”、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等)以及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这些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文森特(Vincent)通过对 20 世纪英国贫困史进行研究后认为,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应对贫困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则认为,如果政策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于一个政策概念,正是政

策失误导致了不平等并产生了贫困。③冲突学派。冲突学派认为，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导致贫困现象的根源，贫困是群体间利益争夺的结果。因为，每一个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但由于可供争夺的资源有限，各个群体在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均等前提下，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Lenski）指出，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的资源很少。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则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能对决策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也没有力量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而最终的结果往往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Lenski, 1966）。④功能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甘斯（Gans）。该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的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之时重要性程度不相同，同时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存有差异。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主要的价值目标，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而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需要赋予这些位置较高的报酬；与此相对，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角色和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相对较低。甘斯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贫困具备正向的社会功能，即社会存在不平等能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比如，穷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可以间接促进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人较低的消费水平，可以延长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此外，穷人还可以作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

(Gans, 1979)。⑤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市场需要贫困。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贫困是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波动的结果,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的贫困是不可抗拒的。

第二类,文化论或文化解释论。20世纪60年代初,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Edward C. Banfield)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等对贫困进行文化解释的专著相继出版,这些专著通过对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以此为开端,西方学者开始了贫困问题的文化解释研究之旅。刘易斯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贫困亚文化的存在,一方面是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迫不得已采取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相当一部分穷人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中。因此,刘易斯认为消除贫困仅靠在物质上帮助穷人是不够的,解决问题更多需要的是彻底改造贫困文化。只有当穷人放弃贫困亚文化并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才有可能真正摆脱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认为贫困亚文化只是主流文化中的暂时现象,是可以改变的;但在其他研究中,刘易斯又强调了文化价值的中心地位,认为贫困文化和贫困现象具有持久性。他认为贫困亚文化主体对社会主流文化可能采取的拒斥、隔绝态度,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那些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棚户区孩子,在心理上是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的(Lewis, 1966)。班费尔德认为,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

的观念和行为，是贫穷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的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要改变其贫困现状，必须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Banfield, 1958）。哈瑞顿在他的著作《另类美国》中把穷人描述为“另类美国人”，认为穷人作为社会的非主流，存在有别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由于这种亚文化的稳固性，穷人是一个稳定的、不思变迁也不能变迁的群体；也因此，穷人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走出这个美国另类群体（Harrington, 1962）。后期，延循文化导致贫困的路线，诸多学者继续对贫困的文化解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反思，并产生了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凯尔索（Kelso）等学者提出了规范失落引发贫困及贫困人的反社会行为的理论，涂尔干（Durkheim）则将经济发展后城市底层阶级人口不断上升的现象解释为“社会反常”（anomie）。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时期，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转型“失范”状态。此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规范尚处于酝酿阶段，于是出现了许多贫困的事实和贫困者的反常。因此，在变动不定的社会里，必须通过灌输一整套强调自律与勤勉的文化价值观念去控制穷人，以达到社会稳定。凯尔索通过对美国人价值观进行研究，发展了涂尔干的理论。他提出，当旧的规范面临丧失和调整时，许多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更容易放弃原有的规范，穷人们的经济地位也将随之遭受远较社会其他部分多的损失。所以，社会规范的弱化加剧了底层阶级不幸的上升（Kelso, 1994）。甘斯在他的《贫困研究中的文化与阶级：一项反贫困的探讨》一书中，一反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穷人在富裕社会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他将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两种，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差距远小于穷人，穷人在期待与现实无法

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发展自己的亚文化。对穷人而言，这既是迫不得已，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一个反映”(Gans, 1968)，所以需要注意文化因素。布迪厄(Bourdieu)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指出穷人的窘迫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在对社会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受教育机会和就业不平等状况进行研究后，布迪厄指出，权力决定着教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当教育制度被视为争夺和维持统治阶级地位的重要工具时，文化资本潜在的不平等分配是必然的。威尔森(Wilson)提出了社会孤立理论，认为美国工业中心城市的贫困急剧增加，是都市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伴随美国的经济转型，许多重工业企业从城市迁往郊区，许多中产阶级因此移出城市，都市内城成为穷人集合的区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孤立的(次文化)区域。威尔森以“集中化效应”一词指称该区域居民的生活情境，指出正是城市发展的错位，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人群，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没有工作，或者不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因此和心理和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穷人由此产生了独有的生活态度和一系列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道德规范。所以，都市内城穷人的贫困是经济转型造成“社会孤立”的结果，是社会隔绝了穷人、抛弃了穷人(Wilson, 1987)。

综合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两种理论学派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在贫困问题研究结论上是存有分歧的。具体而言，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①贫困现象的描述和贫困概念的界定。结构解释理论注重贫困的客观状态，认为贫困是一种客观存在，包括收入、职业、地位、市场机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匮乏状态；文化解释理论则强调贫困是一种特征，包括贫困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特征。如群体的态度，主观心理感受等。②贫困产生的根源。结构解释理论较注重经济财富的研究，重点关注由制度或

政策派生的导致贫困的因素，比如市场机会、就业体系和收入、种族歧视、经济结构变迁等；文化解释理论则主要关注贫困者行为方式和特征、价值观念、信仰、心理特征等内在因素。在贫困的责任归属上，结构解释倾向于将责任归于贫困者之外的因素，文化解释理论早期研究者多认为贫困者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的文化解释理论如甘斯的期待与现实的距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威尔森的社会孤立等，则通过多方面分析认为社会和贫困者应共同分担责任。

③消除贫困的措施。与贫困问题产生根源归因相对应，结构解释理论强调外部要素，认为应主要通过外部因素来帮助脱贫；而文化解释理论则强调内在动力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贫困者原有的文化进行必要的变革或变迁，充分调动其内在的发展动力，才能根除贫困。

④贫困现象是否会长久持续。结构解释理论认为是外在因素导致了贫困的发生，而这些外在因素是可以被人为地改变和克服的。因此，贫困只是暂时的经济现象，不会长久持续；文化解释理论学者则普遍认为贫困是较为长期的文化现象。因为，文化因素较之结构因素，对贫困者的影响更漫长、更深入。总体而言，研究贫困问题之时，结构解释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等客观因素对贫困的影响，较少关注贫困的主体即人的因素；文化解释理论则恰恰相反，强调了人的因素却较少关注人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国外结构解释理论和文化解释理论的上述研究成果，为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之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提供了借鉴。但客观分析，结构解释论和文化解释论都存有不足之处，于西南民族地区山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而言，它们都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贫困问题的实质。除上述贫困归因偏执于社会与主体其中一方之外，它们还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具体而言，结构解释论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结构解释理论认为社会各方面的结构都有引发和导

致贫困的可能，社会结构的调整并不能真正消除贫困。其对社会结构所持的悲观态度，必将影响对贫困问题全面、准确的把握和消除贫困措施的探讨。第二，结构解释理论的各项研究注意了社会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和导致贫困的某方面因素，却忽视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忽略了社会结构各方面的联系。因此，其提出的贫困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脱贫的措施，多为短期的权宜之计，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第三，结构解释理论主要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解释贫困的结构，而较少关注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差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其提出的理论和具体扶贫措施往往与现实存在脱节现象。至于文化解释论，其对文化和贫困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对于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不无启示，但其对反贫困具体实施对策进行研究探讨，对文化扶贫进行系统、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却较少。文化解释理论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理论层面，它试图通过假设来解决问题。即文化是通过对人们的思想作用从而塑造人的行为来体现其作用的，因此可以通过行为特征来反映文化反贫困的具体成效。由于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文化解释理论所持的贫困文化观点，曾遭到其他研究者的批评，指出其存在概念含混不清及逻辑上的矛盾、研究资料选取不恰当、理论的价值预设存在对穷人的歧视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等不足。如一些学者，指出“贫困文化”的形成是穷人适应外在社会情境的结果，并非穷人自身的错误，贫困并非穷人自己的选择，而是穷人没有选择的机会。目前，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实施的反贫困计划，以及维克斯计划、福克斯计划，东南亚“绿色革命”等行动计划收效甚微，也说明了这一点。

客观分析、真正理解贫困，需要文化与结构解释的结合，认定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其背后还有深刻的文化因素。以往的单一政策性贫困研究和单一的物质扶贫方式的反贫

困举措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单纯依靠物质扶贫不能根除贫困，减少物质贫困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成因问题、探讨反贫困举措之时，需要综合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理论，一方面对以往物质扶贫的方式进行总结和反思，转变物质扶贫的结构和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对贫困的文化成因进行研究，并采取相应的文化反贫困措施消解文化贫困。最终，通过将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起来，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才能得到根本地解决。为证明此观点，本研究选取云南省 506 个扶贫攻坚乡之一——临沧市临翔区南美拉祜族乡为调查研究对象，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方法并结合文献分析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对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介入其社会发展推行反贫困政策的历史做了回顾，对其前期的物质反贫困策略取得的实效进行了调查研究，探寻南美拉祜族至今仍旧处于贫困状态的原因。最终，基于大量的实证调查研究获得的证据，本研究认为：南美拉祜族反贫困必须在改变以往物质反贫困结构与方式的基础上，同时推行文化反贫困策略，消除其祖辈存有的贫困亚文化。唯此，才能从根源上斩断贫困链条，通过文化主题的积极参与改变其生存状态。

在研究过程中，前述国外反贫困之结构解释理论和文化解释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分析基础，同时，中国学术界关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奠定了“民族地区”特殊视域研究基础。具体而言，如纳日碧力戈等对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西部大开发实施中各学科研究者对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探讨，云南和其他地区研究者广泛研究的云南省哈尼族、基诺族发展模式等。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拉祜族的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的拉祜族历史文化的调查报告，“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拉祜族简史》。云南学者王正华、和少英编著的《拉祜族文